

中国文学经典书库

乔力 主编

元明清文言小说选

阙真 陈吉生
王福运 肖星明
选注

太白文艺出版社

太白文艺出版社北京图书中心
北京京联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

中国文学经典书库

元明清文言小说选

阙真 陈吉生 选注
王福运 肖明星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元明清文言小说选 / 阙真等选注. —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4.4

(中国文学经典书库 / 乔力主编)

I .元... II .阙... III .①古典小说—作品集—中国—元代②古典小说—作品集—中国—明清时代
IV .I2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31424 号

中国文学经典书库

元明清文言小说选

阙真 陈吉生 王福运 肖星明 选注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太白文艺出版社北京图书中心发行

(北京丰台区木樨园珠江骏景园 17 楼 (010)87873533 邮编 100068)

新华书店经销

华北石油廊坊华星印刷厂印刷

850 × 1168 毫米 32 开 20.125 印张 458 千字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000

ISBN 7 - 80680 - 180 - 4 / I · 099

定价: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065007)

中国文学经典书库

顾 问 王运熙 邓绍基 吴宏一 陈华昌 杨雨前
张 炯 傅璇琮
主 编 乔 力
副主编 邵 东 胡大雷 黄道京 葛承雍

编纂委员会

丁少伦	马自力	马 奕	门 岗	方智范
王定璋	王英志	甘 英	刘文忠	刘庆云
刘怀荣	刘扬忠	刘明浩	刘峰焘	许 总
乔 力	池 倩	朱晓晨	杜贵晨	李 方
李少群	吴兆路	吴章贵	张玉璞	张亚新
张光芒	陈庆元	陈如江	陈洪宜	杨 明
杨 政	欧明俊	武卫华	施议对	周满江
周锡山	赵永纪	赵敏俐	胡大雷	荣 斌
洪本健	高 巍	聂言之	崔海正	桑林佳
徐其超	曹顺庆	章亚昕	黄道京	黄 霖
寇养厚	韩 毓	郭 丹	葛承雍	程郁缀
管士光				

总序

乔力

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会天然地形成一种非常优势,使得中国文学有可能在足够漫长的时间里创造出辉煌业绩,给人类文明留下极为丰厚的精神遗存,供我们民族永远怀想受用。不过,像许多事物都拥载着多元复杂属性一样,如果从对面角度来看的话,则又同时变作某种很沉重的承传负担。因为一旦面对这些山聚海积般浩繁汗漫的书册卷章,便立即涌生出接受的困难困惑:你到底应该读些什么?究竟怎样读?而实际上又能够读得了多少?——局限于主客观种种条件的制约,社会或个人都难以做到无论巨细差等,皆通体包纳,所以,就必然性地出现了如何选择乃至精选的问题,并进而牵涉到一系列的判断观念和运作标准。

新世纪伊始,直面自然人文等各学科门类的分工日趋专精细密、生活工作节奏紧张快捷、实用功利目强化而竞争异常激烈严峻的局面,现代中国早已疏离了古代农业社会那种伴青灯明月、细细把玩体味以穷年皓首的闲散心境与惟求任性适意、不需再计虑效果收益的淡泊无为态度。那么,已然产生凝定而属于历史的文学作品,怎样才能跟随不断发展前进的时代步伐,仍成为文明生活不可或缺的有机构成,融入未来,并由民族走向世界,张扬它永恒的美?换言之,永远是人们感性的愉悦飞扬和理性上育导教化的绝不能被替代的必需。

缘于上述,我们方始编纂这套大型书库,指出了贯通古今、以时代纲领文体的结构框架和精选的、具载恒久垂范意义的“经典”式作品总汇——即通过纵向的历时性观览,从整体上展现自远古

洪荒的先民制作开端直至最较晚近的 1949 年以前的所有中国文学产生、发展、丰富、极盛而蜕变新生的流变轨迹与大略面貌。使人们在直觉审美感受的过程间,获取系统全面的中国文学知识,熟谙洞悉它的每个结构成分。另一方面,也借助横向共时性的断面取舍,使得相应的具体作品充分传现那些关于文学本体以及某一特定文体样式的美学特性和艺术精神;并因其创作巅峰的最绚丽景观所辉耀的最大可能性范型价值,或由一定的阶段空间所显示出的一定更代嬗变类型。要言之,它们既包容有当时的复杂社会现实的典型意蕴,同时又未曾丧失、消解掉充沛张扬的现代生命活力,乃是屡经时间长河的荡涤淘洗,以代积层累方式架构起巍峨的中国文学经典大厦。它千门万户、千姿百态,永远流闪着辉煌璀璨之光。

下面再就《中国文学经典书库》的诸有关事宜略为阐明:

——首先是读者定向。我们关注的是具备中等文化程度,乃至大学生、研究生、工作着的白领蓝领们与所有对中国文学感兴趣的最广泛的读书界朋友。衷心希望《中国文学经典书库》能成为你们的“精神家园”,为你们不断追求探索的焦灼心灵伸展开一片清新温馨的绿荫,吹进青春热情的气息。

——其次是编纂的框架构想和意图。这里自然是以文学作品为主体部分。具体而言,每种精选本前皆首先设置“导论”,概述本文体于此书所界定之历史时段内的演进行程和重要业绩,并在相对应的社会文化大背景上,论析其表现特征、思想内涵及主流艺术精神;进一步阐述因整个文学现状与此特定文学样式自身运动规律所生成出现的创作流派、风格面貌。而以后的篇幅,则以选录的作家作品为单元。“作家简介”除却例行的生平行迹说明外,特别注重其文学活动及与文体相关的创作情形,目的在于强化“评论”色彩,由之使这种个案的微观烛照同“导论”的具体文学现象的中肯评析,以及《中国文学经典书库》收入的《中国文学

史》中的“总论”《中国文学流变概说》所作的宏观把握，形成为点、线、面纵横交织、互相呼应的框架结构模式。至于选录作品，首先认定的是审美价值——一种纯文学本体的意义，然后就艺术创造性来统领其他社会教化等内涵，求得两者的有机融合。其后的“品鉴”，则无论总瞰俯览、远察旁涉为印证而生发妙境，还是探幽抉微、精擘细辨以臻达澄彻洞明之胜地，抑或径从个别主旨、意趣、背景来进行阐释考订，均系视各自实情的需要落笔，并不强求规范一致。相反，我们倒是力求多角度、广视点的繁色纷采，精当出新。

《中国文学经典书库》除却主体的作品部分，还另有五种既断代又互为联接衔接的《中国文学史》，虽然各自具载相对独立性，但整合总观之，则成为从先秦直及现代的通史。考虑到前面主体部分既有的“导论”、“品鉴”及此书中的《中国文学流变概说》，已经构成的交错呼应的网式框架所涉及过的内容，为了避免重复，同时也便于改变、拓展视野，故这部文学通史则侧重于对那个特定时代背景上整体文学面貌的宏观把握，注重描述其行进过程中产生的艺术流派及创作风格、文学思潮、重大现象等，尽可能地弱化一般作家作品的具体剖析。当然，在总则方面遵循这种撰写精神的基础上，各断代文学史也有各自的特点，方式方法并不求整齐划一。

——另外，作为一部集体协力撰写完成的大型丛书，我们一直强调贯穿通体的连续谐调指向，故而与另一类的个体研究著作同样承载着严肃的责任感。应邀参加的多为学术造诣深厚精湛的著名古典文学专家，他们来自北京、上海、山东、广西、辽宁、山西、江苏、福建、湖南、四川、贵州等各地声誉卓著的高等学府和专业研究机构，其中有些熟识并在我主编的另一些丛书、书系里多次合作过，有的却是首次共事。但无论怎样，我们大家都抱有事业与友情并进的相同宗旨，愿意在有限的生命途程中做一些有意义的事，留下一段美好愉快的记忆，以慰藉那本原性的苍凉。

上个世纪初,值当新旧时代交替之际,“五四”的一批知识精英以大智慧、大学识、大勇气,奋然打破了中国几千年的专制、僵化、因循守旧陋习,引进西方近现代文明,倡扬“民主”“科学”精神,吹进来健康新鲜空气,以永远的青春和激情开启一代新风,让人们看到希望和未来——每想到这些,我就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如今又值新世纪伊始,考量已往,眺望前途,将会作出什么样的思考呢?我想,是该出现文学文化大师、学术巨人的时候了。但现今触目所见,太多了些掂斤称两的匠人雕琢的小家子气。就一定意义而言,大师巨人的产生需要最广泛普遍的、适宜的文化基础与时代土壤,但适宜的基础、土壤则需要长时期的积累培植。那么,就让我们脚踏实地,从提高整个民族的文明素养、文化学术素质起始,作一些消除浮躁之气、纯净人们心灵、积累培植基础的工作吧!记得上世纪40年代初,傅雷翻译的罗曼·罗兰《名人传·贝多芬传》的“译者序”说:“不经过战斗的舍弃是虚伪的,不经劫难磨炼的超脱是轻佻的,逃避现实的明哲是卑怯的;中庸,苟且,小智小慧,是我们的致命伤……现在,当初生的音乐界只知训练手的技巧,而忘记了培养心灵的神圣工作的时候,这部《贝多芬传》该有更深刻的意。”我想,这是“五四”精神的延续和一种新的演绎。由是言之,除却工艺技能与客观科学知识的训练、学习外,文化文学素养的充益提高,对于“心灵”来说也是绝对必要的。我们同着新世纪的朝阳前行,是应该也完全可以有所作为,这既是幸运,也更是历史的使命——《中国文学经典书库》便是最新一份工作成果,愿新世纪的人们喜欢它。

庸庸烦言,限于学识和精力,诸多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朋友批评指正,这是对我们的关心与鼓励,铭感之情将永远在我们心中。

2004年春于北京旅舍

导 论

元、明、清文学在我国文学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由于尖锐的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使大批下层文人进入文坛,雅文学与俗文学之间的森严壁垒开始被打破,戏曲、小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在文学园地中,可以说呈现了百花争艳的全新局面。仅小说创作方面,长篇、短篇、文言、白话等形式与体裁,在这个时期内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

文言小说,是我国古代小说的最早形态,它经历了悠久而丰富的历程,在元、明、清三代这六百多年中,又取得了重要的、辉煌的成就。宋以前的文言小说,主要存在着三种类型:一是记载鬼怪神异故事的志怪小说;二是叙述记载人物轶事言语的志人小说;第三种便是在唐代出现的,以叙述宛转、文辞华艳、故事复杂为特色的唐人传奇小说。这三种类型的小说,在唐代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尤其是唐传奇小说大放异彩,使中国的文言小说发展达到了一个高峰。宋代言言小说是唐代文言小说的继续,但较之唐代,大为逊色。因为宋代小说观念的重心偏向正统理学,弃小说的观赏性不顾,所以造成作品缺乏想象力,语言平实而乏文采,议论见多且趋严冷。但也有值得重视的地方,即北宋中后期开始,文言小说受到市井民众的影响,在作品内容上出现了一些与封建礼教背道而驰的成分,对个人的要求与情感,给予了某种程度的重视,在形式上则吸收了“说话”的一些特点,使文言小说的形式日趋通俗,描写渐为细致,不仅在当时出现了一些成功的作品,而且,由于沿着这样的方向发展,才在元代出现了文言小说的杰作《娇红记》。

尽管蒙元时代文言小说的成就，比之元曲、话本是不足道的，但宋梅洞的一部《娇红记》出现，却标志着我国小说创作有了新的进展。从作品的具体内容来看，《娇红记》在歌颂青年男女的坚贞爱情的同时，真实地揭示了这个爱情悲剧的必然性。第一是封建婚姻制的不容。封建婚姻就其实质来说，乃是一种包办婚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缔结婚姻的唯一形式，门当户对、财产多寡是成婚的基础，决定双方婚事的不是当事者个人的爱情，而是封建家庭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书生申纯与表妹娇娘彼此倾心，互诉情愫，终至私通。这在封建社会中，显然是大逆不道的，礼教伦理不能容，社会纲常秩序也不能容。第二是人类繁衍科学的限制。小说中娇娘之父王通判以“朝廷立法，内兄弟不许成婚”为由，拒绝了申纯的求婚。或许王通判这只是在寻找一个借口，但也不能不承认，这是在认可一个科学的裁断。因此，故事进一步被置于情与理两难的境地中，使作品具有更丰富的社会内涵和人性悲剧的审美意义。《娇红记》虽也是一个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但它不仅突破了唐传奇《莺莺传》那种“始乱终弃”，为封建礼教辩护的写法，而且，较之宋代的同类小说千篇一律采用大团圆喜剧模式，在男女爱情、婚姻问题上，一味持乐观的态度，可谓更为理智与符合实际。

从作品的形式来看。中国文言小说，发展至传奇小说，成果是丰硕的。“这是一个由神怪之界向人间之事及神怪之事与人间之事相结合的演进，是一个文辞的粗简向华艳的演进，是一个由叙述的粗陈梗概向宛转曲折的演进，是一个由篇幅的短小向漫长的演进，是一个由记录意念中的实有之事向有意虚构的演进，是一个由单纯讲述故事向着意刻划人物性格的演进，是一个无意作小说向有意作小说的演进。”（胡大雷《鸿沟与超越鸿沟的历程》）然却盛极难继，到了宋代，文言小说又向志怪小说、志人小说回复，以言情为主的唐人传奇体小说，虽有数篇，但多为垂诫与托古，质直拙重，缺乏深蕴，随后就衰竭不振了。是洋洋万言的《娇红记》问世，如异军

突起，一下子打破了二百年的沉寂面貌，它上承唐人传奇的风采，下开明清文言小说的创作风气，预示着第二个繁荣期的即将到来，成为又一个辉煌的创作行程的先声。

从描写手法来看。描写极为深细，用几万字的长篇巨制写一对情人之间离合悲欢的单纯故事，枝蔓之少，笔力之健，这在文言小说中也是罕见的。小说描写的工致细腻，主要表现在善于从曲折起伏的情节进展中去着力刻画描摹人物动作、情态，并通过他们的动作、情态，揭示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与性格特征。比如写娇娘和申纯从初见到热恋的过程，作者编织了一系列琐细的事件，在逐步展示他们怎样由相遇、相悦到心心相印的过程同时，使人物的思想感情、形象也渐渐地清晰、鲜明起来。《娇红记》在描写人物的思想感情方面，比它之前的任何小说都要深切、细腻，有些评论者甚至认为，它对青年男女的这种丰富、细致的感情，及其发展过程的展示，在元、明间也是首屈一指的。

虽然宋梅洞的《娇红记》可称为传奇小说的正宗，但元代传奇小说创作者还是寥寥可数。直到明初，传奇小说才重新兴盛起来。由元入明的大文豪宋濂、高启所写的元末明初的某些人物传记，其传奇小说的意味就比较浓厚。如宋濂的《王冕传》、《杜环小传》、《李疑传》、《秦士录》，以及高启的《南宮生传》、《书博鸡者事》等。假设说《王冕传》等已经注意到避免史笔那样的简约凝重，开始采取生动叙事、细腻描摹、多方面刻画人物形象等艺术表现手法，那么，《秦士录》、《书博鸡者事》，简直就是传奇小说。当然，这时候一般正统的诗文大家，还没有正式用“传奇”之类的文体名称。明初，真正的、堂而皇之的作传奇小说，并敢于把它与《诗》、《书》、《易》、《春秋》等儒家经典著作相提并论的，要首推瞿佑。

瞿佑的文言小说集《剪灯新话》，共四卷二十篇，附录二篇。这部小说集，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表现手法方面，都独具特点。其一，它与宋人传奇小说古事今事参半不同，其中大多数故事背景，

是在元末至正年间天下离乱之时，其自序即称：“好事者每以近事相闻，远不出百年，近止在数载。”因而，这部作品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如描写乱世士人的心态和命运的作品《华亭逢故人记》、《水宫庆会录》等，或暴露怀才之士想乘乱世取功名富贵，汲端自私的心理，或反映乱世士人在难以才学取富贵的情况下，幻想受知于龙王的愚昧与无奈。而《令狐生冥梦录》、《修文舍人传》等作品，则对现实的黑暗，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披露。尤其是《修文舍人传》中，借已处冥间的夏颜对友人所说的一段话，将人世与冥司的用人制度、赏罚制度等方面进行尖锐对比，批判了现实社会吏治的腐败。其二，在《剪灯新话》这部小说集中，爱情题材约占一半。但它突破了唐宋传奇小说多写士子与闺门女子，或士子与妓女的恋爱婚姻窠臼，男女主角具各种身份，其中描写市民阶层青年男女的爱情作品，扩大了爱情题材的范围，而且所表现的生活情调更带有世俗化的色彩。这些具有浓郁市民气息的爱情故事，往往忽视传统礼教规定，更为注重双方的感情因素。如《翠翠传》中的“淮安民家女”翠翠，与同学私定终身，父母不仅不责怪她，并按她的要求，到男方家去求亲联姻。《联芳楼记》里的薛氏姊妹，大胆、主动追求意中人郑生，双方父母得知后，竟顺水推舟，成全美事。这些有价值的东西，后来一直影响到“三言”、“二拍”中的同类型作品。另外，此书中还有一些人鬼恋爱的爱情故事，可以看到其集志怪与传奇于一体的倾向，这个倾向开《聊斋志异》文体之先河。其三，在表现手法上，《剪灯新话》能够从多侧面来塑造人物形象，着重心理世界、内在素质的表现，一些人物的心理活动描写极其细致、深刻、生动。例如《三山福地志》中所写的：“至日举家悬望，自实端坐于床，令稚子于里门覘之。须臾，奔入曰：‘有人负米至矣。’急出俟焉，则越其庐而不顾。自实犹谓来人不识其家，趋往问之，则曰：‘张员外之馈馆宾者也。’默默而返。顷之，稚子又入告曰：‘有人携钱来矣。’急出迓焉，则过其门而不入。再往扣之，则曰：‘李县令之赆游客者

也。’怵然而惭。如是者凡数度。至晚，竟绝影响。明日，岁旦矣，反为所误，粒米束薪，俱不及办，妻子相向而哭。自实不胜其愤，阴砺白刃，坐以待旦。鸡鸣鼓绝，径投缪君之门，将俟其出而刺之。”及至其门，他忽又自思曰：“彼实得罪于吾，妻子何尤焉。且又有老母在堂，今若杀之，其家何所依？宁人负我，毋我负人也。”遂隐忍而归。这里用一大段的心理描写和能够反映内心世界的举止言谈，把自实开始满怀信心翘首以待缪君遣人送银、扛米来，继而因发现受骗上当，落得个窘迫结局而引发的愤懑，到最后考虑其家小无所依，于是隐忍而归的复杂心情，揭示得委婉逼真、淋漓尽致，给读者以很深的印象。此外，《剪灯新话》中议论明显减少，在叙述故事过程中，逐渐以浅近文言取代史传式的精炼与浓缩语言，这对文言小说更带文学意味，更具小说特征，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正是这样一部既有新特色内容，又有艺术吸引力的文言小说，“人多喜传而乐道之，由是其说盛行于世。”（曾荣《剪灯余话序》）稍后，仿效此书之作很多，最优秀的是李昌祺的《剪灯余话》。

《剪灯余话》，今传本为五卷二十二篇。作者是“效瞿宗吉《剪灯新话》作《余话》一编，借以伸写其胸臆”（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剪灯余话》自序也称其创作目的除了爱奇喜异而一显身手外，还要借此以抒发怀抱，抨击时事：“矧余两涉忧患，饱食之日少，且性不好博弈，非藉楮墨吟弄，则何以豁怀抱，宣郁闷乎？虽知其近于滑稽谐谑，而不惶恤者，亦犹疾痛之不免于呻吟耳，庸何讳哉？”如书中的《长安夜行录》、《琼奴传》、《芙蓉屏记》等，都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现象，表达了人民群众的某些要求和愿望。总的来说，其内容与风格一仍《剪灯新话》。《剪灯》二种在当时社会上非常盛行，人们得之，便爱不释手，以为奇书。但好景不长，随着封建统治的加强，传奇小说的创作也受到冷雨严霜的袭击，《剪灯新话》与《剪灯余话》等作品都遭到了禁毁，以至于我国早已没有足本流传，作者也遭到冷遇与打击，因此，以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人们创作

传奇小说的热情冷了下来。尽管这两部小说集出现后,在当时还缺乏与之相呼应的创作,它们的影响尚未得到真正的发挥,但不可否定,它们已成为文言小说复苏的象征,成为从唐人传奇到清代蒲松龄《聊斋志异》的桥梁。

嘉靖以后,由于思想控制的放松,文言小说与其他文学样式一样,逐渐变得活跃起来。当时的文人,“虽素与小说无缘者,亦每为异人侠客童奴以至虎狗虫蚁作传,置之集中。盖传奇风韵,明末实弥漫天下,至易代不改也。”(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明嘉靖至《聊斋志异》诞生的这段时期,尤其是后半段,一批有较高造诣的诗文作家也参与传奇小说的创作,使文言小说数量迅速增多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颇具特色的作品。如马中锡的《中山狼传》、董玘的《东游记异》、杨仪的《娟娟传》、蔡羽的《辽阳海神传》、宋懋澄《九禽集》中的《负情侬传》及《九禽别集》中的《珠衫》、《刘东山》、戈戈居士的《小青传》等等。其他如徐芳、王猷定、魏禧、李清、王昶、黄周星、陆次云、陈鼎、钮琇、王士禛等,都写出了令人赞叹不已的佳作。随着文言小说创作的繁荣,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些较好的文言小说的类书或选本。明末有《情史类略》、《正续艳异编》、《广艳异编》等。清代张潮编辑的《虞初新志》,影响也很大。清初,经过复兴的文言小说,可以说出现了全面繁荣的景象,不仅创作队伍日壮,作品种类愈多,而且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表现出总结性的成就。其中兼志怪、传奇两体之长的《聊斋志异》,是最具代表性的优秀作品,它把文言小说的创作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峰。

《聊斋志异》共收四百九十一篇和附录九篇。这是作者蒲松龄费尽毕生心血写成的。在《聊斋志异自序》中他这样说:“遯飞逸兴,狂固难辞;永托旷怀,痴且不讳……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嗟乎!惊霜寒雀,抱树无温,吊月秋虫,假栏自热。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可见他谈狐说鬼,并非游戏笔墨,而是以曲折方式批判现实社会,以

隐晦手段表达真实情感。《聊斋志异》中最富有现实意义的,是那些揭露当时社会上贪官污吏和豪门地主沆瀣一气、为非作歹的种种罪恶,深刻反映当时吏治的腐败和社会黑暗的作品。如《红玉》中所写的宋御史,因贪污被罢官回乡后,仍“大煽威虐”,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夺人之妻,并买通衙门,迫害对方,使之走投无路。将统治阶层的飞横跋扈暴露无遗。《促织》中,通过叙述主人公为承应官家的促织“常供”,受尽折磨,后靠其儿跳井自尽,魂托促织,才救得一家人性命的故事,把批判矛头直接指向了最高统治者,深刻反映出宫廷的腐化生活。《席方平》中写席方平为父报仇,进入冥府,更是借对“全无日月”、“尽是阴霾”的阴曹地府的描绘,来再现黑暗的现实世界。《聊斋志异》不仅批判了腐败、黑暗的封建统治,还针对为它服务的科举制度进行了大胆的抨击。其中有的批判科场黑暗腐败、试官昏聩无能,如《司文郎》、《考弊司》、《贾奉雉》等;有的反映知识分子受科举、八股毒害的状况,如《叶生》、《书痴》、《王子安》等;有的揭露由于功名利禄的毒害,导致世风日下,如《胡四娘》等等。《聊斋志异》数量最多、成就亦最高的乃是爱情婚姻题材的作品。它主要表现的是青年男女如何冲破社会各方面势力对他自由情爱的阻碍,而实现其幸福理想。如《细侯》、《连城》、《封三娘》等。如果说,这些作品能够真实地揭示父母之命和婚姻幸福之间的尖锐对立,能够有力地抨击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制的话,那么,其中许许多多狐鬼与人恋爱的美丽的故事,则更多地在于把真实的人情和幻想的场景、奇异的情节巧妙地结合起来,从中折射出人间的理想光彩。像《青凤》、《婴宁》、《娇娜》、《莲香》、《葛巾》、《香玉》、《阿宝》、《鸦头》一类作品,女主人公不仅容貌秀丽动人,而且在爱情生活中,大都采取积极主动姿态,热烈地追求幸福的生活和感情的满足,无处不表现出没有受到封建礼教规范毒害的少女的本性。她们清纯、可爱,令人耳目一新,成为美好理想的化身。

《聊斋志异》在艺术上也取得了巨大成就,它代表了我国古代

文言短篇小说所已达到和能够达到的最高水平。《聊斋志异》非常重视塑造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和安排曲折离奇、引人入胜的情节。作品通过人物对话、生活细节、心理活动、烘托渲染多方面的描写，使天真烂漫的婴宁、爱诗善歌的林四娘、顽皮憨跳的小谢、以及瘦怯凝寒的连琐等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在叙写上，《聊斋志异》虽基本上是传记体，但并不平铺直叙，而是极尽腾挪跌宕、委宛曲折之能事，注意故事构造的“铺排安放、变化不测”（冯镇峦《读聊斋杂说》），力求有起有伏，富于变化，使之“处处为惊心动魄之文，却笔笔作流风回云之势”（但明伦评语），十分扣人心弦。如果说，这些没有能够摆脱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和唐传奇小说影响，只不过作了更充分的发挥，还属于承继前人的一面，那么，它两个方面的创新，则是很值得重视的。一是以传奇法作志怪。我们知道，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叙述鬼神怪异之事，篇幅短小又仅粗陈梗概，语言简约而显露不出文采。待唐人小说以传奇面貌出现时，则“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但小说的主体是人间人事人情人态。这就是志怪小说与传奇小说在内容与风格上各自的传统特点，宋人对之更是泾渭分明。到了《剪灯新话》等传奇小说中，出现了杂以鬼怪神异来述人情人事，如此以志怪法作传奇，开了志怪与传奇融合的先声。而《聊斋志异》绝大多数故事主体是鬼怪神异、狐魅花妖，除了沿用志怪法外，作者还采用传奇法来作志怪。大家清楚，志怪小说虽然具有想象奇特的长处，但苦于“粗陈梗概”，故其想象虽奇特而不丰富，也就是说，缺乏传奇小说那种“叙述宛转”的特长。蒲松龄在创作中，借用传奇的特长，使小说内容精采且充实，情节离奇而生动，展现出极其迷幻曲折的色彩。二是以故事为议论。小说作者以议论来表现自己对小说的看法与感想，以及所期望该小说的社会价值趋向。这在文言短篇小说史上古已有之。《聊斋志异》与以往不同的是，不仅更强调议论的成分，而且，除了单纯性的的议论外，还常常在篇末或议论又叙故事，或

以故事为议论。这二者中的故事有别于小说中主要叙述鬼怪神异,而大都是人间之事。显然这是以人间之事印证鬼怪神异故事,或者说是以前之鬼怪神异之事引出后人间之事。而其中议论的目的,就在于把鬼神之事与人间之事联系起来,以更明确地用鬼怪神异之事,来实现社会批判。如《劳山道士》篇,前述害怕吃苦、喜欢吹嘘的王生,自以为学得穿越墙壁、虚若无物之道,不愿再经受修炼之苦,便下山卖弄,结果大碰其壁,遭人耻笑。此为所记之“异”,后议论时云:异史氏曰:“闻此事,未有不大笑者;而不知世之为王生者,正复不少。今有伧父,喜疢毒而畏药石,遂有舐痛吮痔者,进宣威逞暴之术,以迎其旨,诒之曰:‘执此术也以往,可以横行而无碍。’初试未尝不小效,遂谓天下之大,举可以如是行矣,势不至触硬壁而颠蹶不止也。”可见这用作议论的故事完全是人间之事。但前后强调为人处事目的、方法的错误必然导致碰壁、失败的观点,则是一致的。通过议论,集中地鞭挞了社会不良现象,告诫人们求学与做人的道理。这种写法,是对传统叙事结构的某种突破,是在追求一种不同于志怪与传奇的文体,是对文言短篇小说形式的丰富。

《聊斋志异》问世后,模拟的作品纷纷出现,一下子把文言小说创作推向高潮。如沈起凤的《谐铎》、和邦额的《夜谭随录》、浩歌子的《萤窗异草》、冯起凤的《昔柳摭谈》、宣鼎的《夜雨秋灯录》、吴芾斤的《客窗闲话》、王韬的《遁窟谰言》、《淞隐漫录》等。虽然这些作品都各有特色,但无论是思想深度,还是艺术造诣都不及《聊斋志异》,所以影响不大。从雍正年间到清末,也是文言小说创作的竞争时期。一些作家不满意蒲松龄合传奇、志怪一体的做法,企图以作品来抵销《聊斋志异》的巨大的社会影响。这方面较为突出的是袁枚的《新齐谐》和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其中《阅微草堂笔记》的影响更大。

《阅微草堂笔记》的作者纪昀,是一位地位高而知识广博的学